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接受外來文化的一點經驗

管東貴

壹

在一般人類學書上，往往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例子，說：「首先非洲黑人手裡拿着得自白人的來福槍，其效果反不如弓箭。」

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拿來作多方面的推論分析：來福槍與弓箭，對白人顯然是前者的效用大於後者；如果白人拿弓箭，黑人拿來福槍進行戰鬥，則勝敗恐怕只有等事實才能證明；如果白人拿來福槍，黑人拿弓箭，那末白人之將獲勝利殆可預料。現在非洲黑人軍隊之所以要改用槍炮，大概就是基於上述最後一種情形的緣故。

再則，如果從稍遠的觀點去看，則即使黑人能夠立刻學會使用來福槍，也無法跟白人對抗，因為當彈藥用罄或槍枝發生故障的時候，它的效用不但不如弓箭，恐怕反而會受其累。這大概是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敢把軍火賣給殖民地人民或弱小民族的原因之一。

根據上面這個例子的推論分析，我們對於人與物的關係可以得到這樣的一點認識，就是：弓箭也好，來福槍也好，沒有人則物之本身無優劣可分，所謂優劣都是相對於人的一套能力所產生的

效果比較而言的。所以「物」乃是體現「人的能力」的東西，人無能則物無所出（按：上述物字皆指器物）。推而廣之，文化之於社會，情形也是一樣；惟文化所體現的除了該社會之「御物」的能力外，尚包括更為基本的「御人」的能力。

不過，民族與民族的接觸，文化之為器，往往是以物質部份為其鋒刃。文化較低的一方，則易為此鋒刃所蔽而昧於物與人的關係。近代中國之接受外來文化，即曾經因為這種緣故而有過一番迂迴顛蹶的經驗。

我們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民族，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之中，他的命運直接跟這個社會中的每個份子息息相關。由於這種緣故，所以我們應該真切地去認識這番經驗，以彰明它在我們為生存而奮鬥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意義。

貳

中國幾千年來之所以能高踞東亞，睥睨世界，憑的是他有一支優於別邦或別族的文化，靠着這支文化，他像滾滾中的雪球一樣，體積越滾越大。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種情勢發生了急遽的變化：深目高鼻的西洋人，挾其優於東方

的文化，滾滾而來，把東方的這團大雪球撞得幾乎有解體的危險！

中國有一句俗話，「不怕不識貨，只要貨比貨」。過去中國人之所以一直有一種文化優越感，原因即是沒有可與相比之「貨」。現在面貌不同的西洋人挾其另一種文化而來，有了這可比的东西之後，中國人才有機會去認識外界，並進而認識自己。

第一次讓中國人認識自己的機會是中英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一）。過去中國一向都居於至尊的地位，為鄰邦主持公道，仲裁紛爭。可是現在呢？中國要向別人要求公道了。而結果却是在別人的槍炮威脅之下，不僅繼續吸他們的鴉片，而且還加上了不平等的條約的束縛。這場戰爭，對一向自居為天朝上國之子民的中國人，像一陣震天動地的春雷，它一方面動搖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優越感，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文化啓開了一個脫胎換骨的機運。

鴉片戰爭後不久，跟外國人的另一場衝突是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六一—一八六〇）。在這場戰爭中，北京失陷，圓明園被焚。在這一連串跟外國人的衝突之中，中國吃盡了苦頭，不平等條約就像繩索一樣，一根又一根強加在中國人身上

。這使中國的有識之士逐漸感到，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不僅有亡國之禍，且有滅種之虞。這一警覺遂轉化為中國人發奮圖強，救亡圖存的根本動力。然而要怎樣才能使中國強盛起來呢？在這個問題之下，中國有過一段艱苦的摸索經歷。

中國人的警覺心既然是導源於幾場戰爭，所以很自然地覺得，中國之所以被人置於頹上，是由於戰爭失敗了。中國何以會失敗？答案當是中國不如別人的地方。甚麼地方不如別人呢？這就是中國人在循着一連串的問題摸索前進的時候，踏入第一個空道的起點。

外國人來到中國，跟中國人打仗，既缺理，又缺人，他們能打败中國，憑的是甚麼？憑的是堅甲利兵等物質方面的優勢。循着這一想法找答案的人，自然很容易踏上物的空道，認為中國要想發奮圖強，解除亡國滅種的危險，就應當走物質建設的道路。在當時的情勢下，物質建設的當務之急當然是堅甲利兵等國防建設，而堅甲利兵的捷徑則莫過於模仿西洋。當時政府內一些有權人士如恭親王奕訢、及文祥、曾國藩、李鴻章乃至左宗棠、張之洞等人，聘外國人練新軍，辦外語學校，買炮艦，設造船廠、機械廠等措施，大致即是根據於這一套想法來的。這一套想法的特色是，以物為主體，而以人附於物。在他們的影響下，由政府領導，掀起了一場所謂的洋務運動。這一運動也稱為自強運動；「自強」是目的，而「洋務」則是手段。

叁

三十來年的洋務運動，經過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的考驗之後，證明了它並沒有使中國達到一點強的效果。當時在海軍軍備方面，中國在日本之上，但實際作戰的結果，中國却敗得很慘。這不但使中國幾十年來的努力化為泡影，而且還加上了日本給中國的一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

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失敗創痛之餘，心裡又蹣着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有人、有理、又有洋槍洋兵艦等軍備優勢，何以竟敗於原為蕃屬之列的日本？在比較了中國與日本的情形後，他們發現日本之所以能打败中國，得力於他們的明治維新運動。日本的這一運動，也是由於西方勢力的侵入而引起的，而且也是以自強為目的，以模仿西洋為手段，所以可以說它是日本的自強運動，而其開始之時間則比中國的自強運動尚遲五、六年。不過，日本的這一運動着眼於「人」，從政治建設入手，模仿西洋的憲法制度，由發揮人力帶動發揮物力；而中國的自強運動却是着眼於「物」，從堅甲利兵的物質建設入手，模仿西洋的物質文明，以人附於物。經過了這樣一番比較分析之後，他們看出了甲午戰爭的勝敗之判在於中國與日本的自強之道彼此不同。由於這一認識，遂增強了當時一般人士對於改變政治現狀的要求；而原先由政府人士主導走入「物」的空道上的中國自強運動，遂也因之逐漸回頭轉到「人」的道路上來了。

政治是改善人們生活環境的最根本的力量。有了良好的政治，就可以塑造出良好的社會；有了良好的社會，人就如魚之在水，得以充份發揮其聰明才智。人力是根本，物力是末，能充份發揮人力，就無慮物質方面的困難了。所以對於救中國，這的確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然而，中國的自強運動在「人」這一途徑上，由於對於改變政治現狀的想法不同而分開為兩條道路：一是以康、梁為代表，主張在原有的政治體制上實行改革的「維新運動」（按，甲午以前也有一些人士倡言革新政治，惟認識不同）；另一即是由孫中山先生領導，主張徹底改變舊有政治體制，實行民主憲政的「革命運動」（按，孫中山先生逝世於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遺囑謂「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由逝世之年逆

推四十年，當是公元一八八五年左右，值中法戰爭之後，與中會成立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值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之際。錄此以供參考）。

由於維新運動的基本態度是維護帝制及皇統，所以曾經得到朝廷內若干有力人士的支持而一度大張旗鼓。從這一運動跟政府人士的關聯上去看，則它是由先前的洋務運動脫胎而來的。至於革命運動，則純粹是由民間產生出來的。由於革命運動的基本態度是推翻帝制及皇統，為滿清政府所不容，所以運動的推行非常困難。然而，結果是維新運動失敗了，而革命運動却把中國幾千年來的帝制連根拔了起來。如果我們相信「歷史是體現理性的一個過程」這種說法的話，則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功，就足以證明中國的自強運動只有朝着孫中山先生開闢的革命之路前進，才有光明前途。我們並不否認，維新運動的失敗對於辛亥革命之推翻帝制的成功，有加速的作用；同時也不否認，只有當維新運動失敗後，革命之推翻帝制才會成功。因為維新運動既然已經興起，則革命運動就必須當它失敗，或把它推翻之後，才能取得政權去改造中國。再說，即使維新運動成功，那也只是暫時的，因為中國在當時的情勢之下，民主與君主主的衝突，以及以民族革命為主導的政治革命等，已是無法避免的了，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為生存奮鬥所選擇的理性之路，只不過維新運動的成功會延遲革命運動的成功而已。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革命尚未成功」，我們在上面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成功」，跟中山先生的話並無抵觸，因為事實上中國的帝制是辛亥革命推翻的，只不過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整個革命運動並非只以推翻帝制為唯一的目的。所以他說「革命尚未成功」的這句話的主要作用，只是在於勉勵革命同志，不要因有小成而鬆懈革命意